

築一個以社區為基地的新家 - 為心靈搭建庇護的角落

顧瑜君 陳培瑜
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

台灣推行社區營造工作已經超過十個年頭，而在這此起彼落的社區營造運動中，能夠一路持續走下來，並且日陳出新的社區並不多見，位於花蓮縣壽豐鄉豐田社區裡的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所營造的社區計畫，令人耳目一新，不但跳脫傳統「社會救濟」或「改善經濟」模式的社區工作的思維，更以「有錢做事、沒錢也做事」的態度持續讓自己的社區變得更好，讓社區成為真正的家，大家以「鄰人」的心情照顧需要被關注人們心靈。

豐田社區是早期日據時代的日本移民村，鄰近東華大學。在八年前，陳麗雲醫師率領一群專家學者投入豐田社區總體營造的規劃，成員有中研院台史所、花蓮師院與東華大學的研究人員，為豐田做了初步的整體規劃，當時以「日式記憶」的鄉愁為主軸，規劃了一些硬體設備以及未來發展大餅。後來，一些豐田村民便自助式的組織了牛犁社區交流協會，開始與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的資源結合，彼此的合作直到現在。

除了以一般人所熟悉的「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的精神在持續進行著社區工作，社區志工更在意的是：**如何創造一個可以兼顧服務他人與自我成長的社區平台**，讓參與工作的社區志工和所有的社區居民都擁有一個相近平等的空間。因此，在將近八年的努力中，牛犁社區交流協會不僅嘗試各種社區導覽的DIY活動，也不斷研發新的社區計畫，直到最近，整個社區工作的輪廓大致浮現，我們才發現一種社區的真心在默默地發酵，一些庇護社區老弱心靈角落正在開展，而這些對社區心理輔導全然外行的村民，卻以最鄉土的方式，濟助了社區最需關照的人們，在鄉親土親人更親的簡單構想下，〈禮運大同篇〉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願景是可以實踐的，而牛犁已經開始這麼做了。

天送伯文物館：老人是社區的寶

天送伯是個台灣鄉村典型的例子，他是孩子都不在身邊的獨居老人，雖然沒有經濟上的困難，但如同臺灣傳統鄉村地區青壯年人口外流的處境一般，天送伯也有相似的生活困境要獨自面對。

鄉村的老人心在受苦，卻要小心地收藏起來，免得露出寂寞讓外地的子女擔心。在台灣鄉下農家，子女能到外地發展算得上「有成就」，如何能期盼他們抽空回家陪伴，何況每次他們回花蓮，都彷彿會耽誤他們的事業；每次外地子女們

面對留在鄉下老人家的生日，為了表達孝心，通常會回家安排生日餐會，但子女能如期回來的，卻不是那麼多見，而能夠攜家帶眷到齊的，更加少數。像這些許多生活上的點點滴滴，總是只能被鄉村老人擱在心頭，話卻說不出口，以生日餐會來說，即使勉強湊足的人場，也是在熱鬧時分就感受到離別降臨的在即；茶足飯飽之後，追求成就的子女們是不能久留的，以致於一頓歡樂的聚餐居然帶來老人家更落寞的惆悵，這種社會變遷結構的處境，究竟能帶有多少兒女承膝的歡笑，只有老人家自己心底明白。

鄉村的老人就在這種處境下，每天默默的騎著腳踏車在熟識卻冷清的社區中間晃著，或者找點可以做的事情消磨時間，或者找人泡茶，甚或湊熱鬧賭點小博，看著鄉村的沒落以及自己已經無用的農耕技能，一天度過一天。

像天送伯這樣的老人家，在豐田社區裡經常可見。但是，傳統的智慧告訴我們，老人家的社會經驗和累積的知識仍然有助於社區和社會的整體發展，端看掌握社會權力和資源的青壯年人口如何看待老者的智慧，也就是說，社區裡老人家的「心靈狀態」不應被懸置，他們對於整體社區發展也可以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力。

在一次無意的談話中，牛犁的人發現天送伯家中存有大量舊時的農作器具，鼓勵天送伯把這些古農具整理起來，同時，牛犁人也帶著社區裡的「青少年服務隊」協助天送伯，整理這些灰塵佈滿的老東西，希望在不重視農業發展的社會風氣之中，對已經廢而不用了的農作器具再找到新生的可能。牛犁人的構想是：讓古農具成為鄉土教材的一部分，但沒想到卻因此帶動對老人心靈的呵護。

天送伯也很起勁的把各種古農具弄出來，花心思布置、擺設，於是社區裡悄悄的發展了一座由天送伯的農具倉庫所改建的「天送文物館」，當初十分簡陋，連個招牌都沒有。然而，當這個「館」漸漸成形後，它需要觀眾，在缺乏知名度與觀眾的時候，牛犁人把社區青少年服務隊找來參觀，也邀請社區裡的中小學到這裡做戶外教學，後來，陸陸續續也有好奇者去看，連有線電視台也聞風而來，報導這個不是很像博物館的「文物館」。天送伯在社區裡騎鐵馬的樣子都變得十分有元氣。

然而，讓古農具被放入一間整理完善的「古農具文物館」並不是牛犁的人唯一的目的，他們讓天送伯的角色更進一步從只是古農具的主人，轉變成為認識古農具的專業講師。剛開始，牛犁志工陪著到天送伯文物館參觀的人們，協助天送伯解說文物，但怎麼說，都不如天送伯自己「現身說法」來得清楚，且充滿了鄉土的風味，漸漸的，志工的角色淡出解說的工作，讓天送伯自己站上第一線做解說員，於是「阿伯」變成了「社區的老師」。

天送老師長期農作的生命經驗所累積的專業，不僅讓社區青少年多了另一個學習的管道，也讓其他遠道來到豐田地區參訪的學校師生，看到了豐田社區老人的不同樣貌，對農業與農人也產生不同的理解與尊敬，更重要的是，一個老人的

心靈獲得了照顧。去年天送伯生日時，兒女們講好要回來的，辦桌數也定下了，但臨時兒女卻無法回來，天送伯並沒有去退訂，反而招呼牛犁的人去吃壽席，大夥也樂的吃一頓大餐，餐會中歡笑不斷，這次沒有人要急著趕火車或飛機離席，心有愧疚的兒女們來電話抱歉，卻沒有聽到他們父親哀傷或無奈的語調，原本擔心老父隱藏的落寞不見了，反倒聽見老父高興的說，牛犁的人去吃如何高興等等，於是兒女們撥電話感謝牛犁的人代替他們照顧父親，希望日後可以回報，牛犁的人說：你們就在住處身邊看看有沒有需要照顧的老人吧，你的父親我們來照顧，你們就近照顧別人的父親，這就是我們期望的回報。

從鄉土教材、農具展示，最後勾聯到心靈的呵護，這條路一路地邇而來，牽動多少台灣孩子的牽掛，也撫慰了多少寂寞的心靈；坦白說，這個小小的「文物館」實在不是個什麼像樣的文物館，連讓人起眼也談不上，但是當一個寂寞的心靈被照顧了之後，社區的「寶」就明亮起了，這個「寶」不是農具古文物，去參訪的人感受到的並非古文物的力量，而是那個活的老人所散發出來的台灣風味，而真正讓參訪的人回味無窮更是那「偶發機緣瞬間展露的關愛」。

社區服務隊：青少年是社區的動源

21 世紀的鄉村青少年往往成為社區的痛腳，他們一直在升學與打架的兩個端點中擺盪，不管在哪一個端點，都令大人不適。豐田社區只有一個國中，村民戲稱這是社區的最高學府（在另一個職業學校還沒有設置前確實是如此），而孩子們來自好幾個小學，到了國中形成了小派系，結集起來鬧點小事，在社區裡也見怪不怪，但每次打架實在叫人煩心。牛犁的人眼看著自己的孩子漸漸大了，他們升學的機率並不是太高，能期望的不多，但如何可以不讓這些國中生繼續打三年呢？他們經過討論後發現，到了國中再解決打架問題，已經為時已晚，國中強調競爭與升學的文化下，同學都是升學的敵人，要是不打架？難，頂多少打一點。於是，牛犁的人決定在孩子們還沒進國中前，先「製造」他們不會打架的可能。

幾個爸爸們利用週休二日的時間，開始邀請三個主要小學的高年級同學一起到廢耕的農地上踢足球，讓來自不同學校的孩子們有機會互動與競爭，在缺乏娛樂的鄉村，這個邀請竟然飽受孩子們的歡迎，他們踢出興趣來，也踢出感情來，這群一起踢球的國小兒童進了國中後，原來壁壘分明的小學派系色彩淡化了，打架的情況也有所改善。根據牛犁的人自己的說法：「藉著練足球，讓他們早點增進對於彼此的認識，進了國中之後，就算年輕氣盛而有衝突，也可以因為彼此的認識，而減少互相傷害的機會！」在這樣的「長期計謀」之下，豐田社區不僅減少了三個村的學生之間的衝突機會，更間接的為小學老師和國中老師之間做了長期的、完善的「新生訓練」。

這種從家長透過在地經營中發展出來的「新生訓練」的觀點，實在讓人印象深刻，在倡導開放、進步的教改浪潮中，一般學校的新生訓練仍然離不開傳統的

實施模式：校長、主任和導師的輪番訓話、新生秩序的訓練、校園環境的走馬看花、學唱校歌……等較為刻板的活動內容。在既有的學校體制內，對於國中新生面臨學習方式轉變的不適應、青少年時期人際關係的恐懼、升學壓力……等等，對於國中校長、主任和教師而言，那似乎是國一新生「理所當然」必須知道的、必須自己解決的部份，或者家庭需要自行處理的適應問題，也無法再短短的幾天新生訓練中完成。

然而面對單親與隔代教養比例越來越高的鄉村而言，家庭幾乎無力協助孩子從小學生轉變成中學生，很多孩子會找時間會到小學去尋求國小老師的幫助。從小學畢業的七月到國中開學的九月，只有兩個月的時間學生必須「表現」出一個國中生「該有」的模樣；也就是說，學生不僅必須以極其快速的方法、更必須隱藏自己與他人不同樣貌的態度，進入國中的生活。但是國中三年裡，青少年還有更多必須面臨的問題和困難需要成人的引導。因此，牛犁的人便繼續以「陪他走一段」的心情組成了「壽豐鄉青少年服務隊」，將青少年帶進每一個社區活動當中。而在讓青少年服務隊參與社區的活動中，他們也發現：讓每一個孩子都被很多的大人認識，這些孩子比較不會變壞，因為社區裡的成人都變成他們的家人啦，叔叔伯伯阿姨嬸嬸一大堆。

此外，由於鄉村生活的單調，讓多數的孩子覺得待在家裡很無聊，而家裡的大人也因為沒有辦法提供一個較好的生活典範以供學習，因此這些青少年不去做壞事真的很難，他們總是要找到發洩精力與消磨時間的對象，不找人麻煩，就找東西麻煩，所以沒事去破壞社區公共建設是常見的事。由牛犁交流協會所組成的青少年服務隊，對於社區與青少年來說，不僅只是提供了學習的管道，也為整體社區人口素質的提昇提供了另外一個成長的空間。

另外，牛犁的人也為社區青少年設想了一個「緩衝空間」，讓他們有歸屬感。牛犁的計畫是：他們在社區找到一間借用的房子當「教育站」，為了布置，讓青少年帶來他們已經不合穿的衣服，請社區媽媽協助縫製成一個個獨特的抱枕，讓「教育站」的地板多了孩子記憶裡的物品，同時，牛犁跟東華大學要來淘汰的電腦，請社區懂電腦的人協助修繕與改裝，設置了一個青少年「鄉村網咖」，他們可以去用電腦、看電影、做功課的地方。後來，牛犁發現，許多深夜被醉酒的父親毆打青少年，也會暫時把這地方當避難所，避避風頭，等父親睡著後，自己再溜回去，而不需像以前在社區如鬼魂般的遊蕩、等待。避難期間，他們可以看書或看電視、用電腦，順便吃點牛犁預備的餅乾泡麵，沒有餅乾了就吃大姊姊泡咖啡的白糖包（一位從花蓮市區來參訪的小學生，還把這一段社區參觀的所見所聞做成了繪本，邀請我為繪本寫序言，請參見附錄一&二）。

青少年在社區裡往往被視為頭痛的來源，但鄉村社區的家長沒有能力去學習青少年心理學等講座的机会，為了生計也無暇去照料青少年心靈層面的空虛，牛犁的人經營這個場域，使青少年有歸屬，並成為社區服務的來源，社區裡辦活動

他們會去幫忙去帶領小學的孩童，會幫忙準備與善後，鄉村雖然可能是他們即將要離開的土地，但至少在這青春的歲月，留下的記憶不是只有升學的苦悶與打架的傷痛，多了一些可以去跟別人說說的好事與記憶：就算不能留在家鄉工作，對離家也多一分不捨吧，不會是覺得走的越遠越好吧，頭也不回的離家遠走高飛：而或許他們有能力了會想回到家鄉的，因為這是一個值得留戀的所在，如果不是青年都往外走了，鄉村的前景會不會好一些呢，牛犁的人應該是這麼想的。

他鄉即故鄉：婦女是社區的新力

近年來，外籍配偶在鄉村的比例突增許多，有人預測外籍配偶的問題與新台灣之子的問題將會日益嚴重，然而如果我們實地在鄉村訪查，被宣稱的問題與現實狀況並不見得相符，她們也未曾對社區造成巨大的、不好的影響。雖然她們有語言文字上的隔閡，但是對於自己家庭、社區的心力，並不亞於一般的台灣媳婦。幾年來，她們的孩子陸續進入學校，而孩子學業的問題卻不是她們的能力所可以協助解決的。但是，她們卻不會輕易放棄，為了孩子，她們主動在社區裡組成識字班，只要求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提供師資。

在社區居民與她們互動的過程當中，開始減少對於外籍配偶的生疏感，也開始和她們話家常，鄉村媳婦們就像是姐妹一般，共同討論烹飪美食、家庭、孩子、社區…等等的各種問題。如今，在牛犁所舉辦的活動當中，外籍媳婦也主動參與，希望可以從積極參與的活動當中，讓這個「他鄉」開始變成「故鄉」。

相對於外籍媳婦，另外一群持續深耕於地方社區的是在地「社區媽媽」，也在這塊土地上持續努力著。她們多半是台灣其他地方嫁到豐田的媳婦，坎坷的是，她們的先生可能失業、沈溺於賭博，甚至家暴毆妻，但她們在牛犁的促成下，從學習拼布、軟陶、美食…等各種手藝開始，開始發展出原屬於個人的、在家庭生活之外的潛能，同時在配合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的活動中，這些能力和手藝也開始被一一看見，展現屬於自己的價值。她們的家庭困境可能依舊，長期不會改善，但是她們自己發展轉圜空間，就如一個丈夫好賭的媽媽說：「我先生去賭博，我也沒辦法改變他，就當他每天出去做生意，生意有賺有賠，如果贏了就當作那天有賺，輸了就當作那天賠錢」，她就這樣「在地的」發展出這樣面對自己困境的「觀點」，面對自己苦難生活就不會感受太壞或哀怨，跟社區其他婦女們一起弄有創意東西，忙一些社區的事情，以平衡了她的處境；社區也不把她視為需要被照顧者，找她來一起作事就足夠撫慰陪伴她了。這個原本可能會被認為需要被幫助的人，現在正在創作陶藝，偶發機緣瞬間展露的關愛，使得一個缺乏對這類婦女援助的鄉村小站，反而給了她一條新路。

以現今由牛犁的人協助經營的「壽豐鄉文史館」為例，這群在地媽媽們開始自己設計各式作品，同時也開始積極為自己的作品籌劃展示的空間、規劃相關的活動，這些事情原本並不在「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的規劃之中，但是這群在地的

媽媽卻用自己的力量讓牛犁的種子一一發芽。

我們需要「鄉村小築」：舒緩、停歇與體貼的心靈

當豐田的牛犁成立之初，牛犁成員並不是村里最優渥的人家，他們有著自己的經濟困窘，也有著自己家庭的種種問題，可是，他們願意從家庭走到社區，不與政治掛勾，不作大型活動專案，卻一點一點的作著「人親土親」的社區工作，這裡沒有任何虛誇的雄心，也沒有太複雜的人事，更沒有西方模式或日本模式，而是透過日常互動的交往，幾許的警覺，幾次的小動腦，又真切地看到實際的需要，不知不覺就做起「濟弱扶傾」的工作；不論是社區裡的老人、青少年、外籍配偶、媽媽等各種社區裡的弱勢居民，看起來雖然都像是被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所照顧的對象，但是這些人在過程當中，卻逐漸增長出屬於自己的力量、發展出適合個人的面貌。

在全球化的漩渦裡，在地化顯得十分乏力，尤其是農村在全球化的肆虐底下，民生凋閉，教育缺乏動機，老年、孱弱者、弱勢者都更是缺人關照，任何制度性的計畫（如老年年金）都屬於外部性的設計，無法直通心靈，當老人的寂寞空虛相應於黃金時期的農村歡樂，實在是天壤之別，而青少年在毫無奮鬥意志的消沈之下，與當年農村窮小子努力求上進的時代，又相去以遠，再加上男人酗酒家暴，婦女人心危殆，不得不想辦法自救。整個農村的內部空虛，人心宛若荒漠的城牆，而所謂「富麗農村」的建設經費也只能說是簡單的壁飾，荒漠之心依舊等待甘泉。豐田社區能夠從外部的建設走向心靈的故鄉，可以說是為社區營造起了精神性的覺醒，而自然地走向「濟弱扶傾」的自主輔導，也說明我們有能力從本地話的經驗找到自己的方法，也裁剪出自己需要的樣子，適合自己的文化與土地。

農村心靈需要一種舒緩的步調，一種可以歇腳的安寧心思，以及貼心的設想，逐漸從在地的意識裡一點一滴地累積起來。大把的銀子只會破壞這種舒緩、安寧與貼心的主調，可是過度的缺乏也足以讓農村人心窮蹙，牛犁工作室能夠從缺乏與過度的張力之外拉出一條情感線，讓古舊的農具獲得新生，社區進駐新資源，更讓農村的老中青各階層各有其舒緩與開拓的空間。原本以「營造」為宗旨的社區運動其實隱含了相當程度的「成功」意圖，希望在故舊房舍與在地區民身上看到新生命的曙光，殊不知這其中硬加上去的成分高過在地化的真正本意，所以在臺灣十餘年的社區營造之下，有相當多案例都是大把金錢下的失敗品；而牛犁工作室能走到今天，成功之處並非光鮮亮麗的富麗農村建設，或者就業機位的提高，而是在看似發展的建設規劃底下，充滿了許許多多不起眼的「意外」，此等意外在不經意的日常生活時刻默默地流露，將看似平常無用的「老古板」拉回到現實生活中，將被摒棄的歷史感召喚重現，而能有過去、現在、未來互相交織的立體感，而此，才是真正在地精神所在。